

墨子里籍東、西魯說論爭

——兼評蕭魯陽「西魯說」引證之方言材料

陳 彥 君*

提 要

墨子姓名與里籍¹一向是墨學研究爭議所在，由於文獻記載不足，學者紛紛提出新說，企圖能更明確地描述墨子其人其事。近年來，墨子里籍之討論更是空前熱烈，並逐漸形成兩大勢力，即「東魯說」與「西魯說」。東魯說已漸漸整合，以張知寒提出的「滕人說」為主，此說多自先秦古籍搜索例證，並佐以近代考古發現；西魯說認為墨子乃楚魯陽人，援引方言研究與民俗現象等新材料論證。

本文 96.07.31 收稿，96.11.27 審查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¹筆者於本文通篇使用「里籍」一詞，以代替常用詞「籍貫」，乃因大陸學者多用里籍稱之，以避免於引用文獻時造成誤解。



本文旨在闡明各說，並分析墨子里籍東、西魯論爭形成之因，最後談及此論爭之現況與展望。透過對各學說證據及其合理性的探究，期望能使墨子里籍議題紛雜的理路更加清晰。

關鍵詞：墨子、墨子里籍、東魯說、張知寒、西魯說、蕭魯陽、魯山方言



The Debate over Mozi's Hometown: “Eastern Lu” or “Western Lu” and Xiao Luyang's Use of Dialect as Evidence

Chen Yen-Chun*

Abstract

Among the questions surrounding Mozi (墨子) and his thought, there has been much disagreement about his original name and hometown. As no direct evidence is to be found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 scholars have been left to their own resources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and obtain a clearer picture of Mozi's life.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heated discussion as to where Mozi's hometown was, with opinion largely being divided between two possible solutions: 'Eastern Lu' and 'Western Lu'. The former view locates Mozi's hometown in the ancient state of Lu (魯) in the pre-Qin period, or in what is now Shandong. The latter view argues in favor of a site in the

*Second-year M.A.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cient state of Chu (楚), or in what is now Henan. In other words, Mozi's hometown is either to the east (Shandong) or to the west (Henan), thus giving rise to the terms 'Eastern Lu' and 'Western Lu'.

The argument for a location in 'Eastern Lu' was advanced by Zhang Zhihan, who drew evidence from pre-Qin records. Many scholars accept this notion because the evidence presented is thought to have been recorded soon after Mozi's death, thus giving it greater credi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Western Lu' theory put forward by Xiao Luyang relies heavily on material taken from the dialect spoken in his own hometown of Lushan (魯山) in Henan.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how this dispute arose and review the different ideas of where Mozi was born. In particular, given that all of the examples of the Lushan dialect that Xiao Luyang uses are taken from his own, modern, dialect, I think that his evidence bears further review. Ultimately, I hope to show which position is more tenable.

Resolving the question of where Mozi was born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his life and thought. If we know where his hometown was, we can understand more about his childhood and look at how his hometown customs impacted his thought.

Keywords: Mozi, Mozi's hometown, Eastern Lu, Western Lu, Zhang Zhihan, Xiao Luyang, Lushan dialect



墨子里籍東、西魯說論爭

——兼評蕭魯陽「西魯說」引證之方言材料

陳 彥 君

一、前 言

關於墨子里籍歸屬問題，由於墨學之衰微，清代以前鮮少論及，即便曾論述也是寥寥數語。如司馬遷《史記》未替墨子作傳，僅於〈孟子荀卿列傳〉以二十四字論之：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²

墨、儒於春秋戰國並稱一時顯學，孟子亦稱：「天下之言不歸楊即歸墨」³，至漢初墨子學派竟已失勢而無作傳之必要⁴。其後儒術獨占歷史舞臺，墨學之精要與墨子其人其事，不再是世人關注焦點，後世各刊本多脫謬漏誤，直至清代，乾隆年間進士畢沅與著名學者孫詒讓，分別為《墨子》重新校訂，重啓墨學研

² 見漢·司馬遷：《史記》（上海：中華書局，1959年），卷74。

³ 見清·阮元（校）：《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卷6上。

⁴ 孫詒讓：《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680。曰：「故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其詳。」



究。畢沅之作雖不及孫詒讓，然亦非無功；畢沅針對東漢高誘在《呂氏春秋》注所言之「墨子，名翟，魯人也」，提出：

魯，即魯陽，在魯山之陽。⁵

此說可視為開啓後世「西魯說」之先聲，後有清代武億等從之。

民國以來，除了從哲學、邏輯學等角度探索《墨子》一書內容，學者也致力於《墨子》中論及語言學範疇之研究，針對字句訓詁亦多所著墨，近幾年更有援引方言與出土文獻材料者，然當中之可信度仍需吾輩仔細檢視，才不致使方言材料誤用，或使人誤解「引用方言材料，即增加其理論之依據」。而其中「方言之引證正確與否、是否具代表性，有無旁證」等問題，值得進一步討論。

近十年中國大陸墨學研究產生一個熱門議題——墨子里籍究竟屬於東魯（今山東滕縣）還是西魯（今河南省魯山縣）？筆者原以為此議題之形成，只是學者各憑所據，各自發表論點，然而深入探究後，發現竟牽涉兩大地區的經濟發展與觀光收入問題；近期最顯著的例證乃電影「墨攻」之拍攝，兩地競相爭取電影公司與劇組前往「真正的墨子故鄉」取景，企圖藉由電影莫大的影響力獲得更多世人認同⁶。是故墨子里籍歸屬使兩地展開角力，學者莫不力求新例證，甚至廣建紀念館、紀念碑，舉辦學術會議、藝術演出等，雖也促成「墨學」之推展，但雙方堅持己見，指對方捏造歷史，藉搶奪「墨子故里」之名以發展經濟，所以遲遲無法建立共識。近幾年研究墨子里籍之大陸學者，非贊成東魯

⁵ 參自李漁叔：《墨子選注》（臺北：正中書局，1977年）。

⁶ <http://www.mov.cn/bbs/viewthread.php?tid=6115> 記載電影「墨攻」拍攝期間相關新聞，其中2006年11月02日「導演張之亮率領的電影《墨攻》主創人員來滕祭拜墨子，並在火車站廣場向墨子銅像敬獻了花籃。在滕期間，《墨攻》主創人員和全國電影院線的代表還參觀了墨子紀念館。」不論原因為何，等於該劇組認同「滕」一地是墨子故鄉。



說，便是西魯說，未能平等看待兩方提出之材料；或許囿於地緣、經濟等因素，直至目前東、西魯論爭依然持續。

自文化認同與維護的觀點而言，兩地與相關人士試圖發展故里經濟能力與地方知名度，其用心可以理解。但針對「墨子里籍」議題，我們應當從眾多資料中，採取可信度較高者，且排除時代較晚、疑為託古而成者；並仔細審視雙方引述與運用論證之邏輯，企圖為「墨子里籍東、西魯論爭」整理出較客觀的綜合評述。

二、墨子里籍各家學說

以下分節列舉目前可見文獻中討論墨子里籍的各種說法，略述其梗概，並簡要論其得失，其下或舉其他學者之評論，或闡發筆者個人之看法，企圖於正式進入「東、西魯說」之論題前，對相關研究成果進行爬梳。

由於東魯說（滕人說）與西魯說（楚魯陽人說）成為兩大勢力，除此二說以外的諸家說法，便逐漸脫離討論核心，非本文討論焦點，故只於本章略論之。

（一）、宋人說

「宋人說」源於《史記》記載：「蓋墨翟，宋之大夫。」雖未指明墨子乃宋人，然亦使後世探討墨子里籍時，尊《史記》之言而以為墨子乃宋人，後世有葛洪、李善等從之⁷。宋人說遭梁啟超批駁，並引文獻為證：

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墨子·公輸》）

8

⁷ 見梁啟超：《墨子學案》（臺灣：臺灣中華書局，1985年），頁1。

⁸ 見周·墨翟：《墨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卷13。



梁氏主張若墨子為宋人，應直接稱「歸宋」，而非「過宋」⁹，此論殊是有理；又梁啓超除了反對墨子里籍位於宋國，也認為墨子為「宋之大夫」一說證據不足¹⁰。

由於《史記》所言無先秦文獻的有力支持，「宋人說」實已從墨子里籍爭論的中心排除。

（二）、魯人說

傳統「魯人說」，此「魯」指今山東省曲阜一帶。此說源於東漢高誘《呂氏春秋》注：「墨子，名翟，魯人也。」而系統性地從文獻中檢索「魯人說」理論依據，則從孫詒讓開始，並以為「以本書（筆者按：《墨子》）考之，似當以魯人為是」¹¹，其論據有：

墨子自魯即齊。（《墨子·貴義》）¹²

遂為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墨子·魯問》）¹³

公輸般為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呂氏春秋·愛類》）

14

⁹ 梁啓超：《墨子學案》（臺灣：臺灣中華書局，1985年），頁1-2。

¹⁰ 同前註，頁2。梁啓超除反對「宋人說」，也不贊成《史記》所言「蓋墨翟，宋之大夫」，並提出：「查本書中，絕無曾經仕宋的痕跡。太史公或因墨子曾救宋難，所以說他仕宋。其實墨子救宋，專為實行他的兼愛非攻主義，哪裡論做官不做官呢？墨子曾說：『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貴義篇》）當時的宋國，就會行其道聽其義嗎？墨子是言行一致的人，如何肯立宋之朝？所以我想：墨子始終是個平民，沒有做過官的。」

¹¹ 同前註4，頁681。

¹² 同前註8，卷12。

¹³ 同前註8，卷13。

¹⁴ 見秦·呂不韋：《呂氏春秋》（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卷21。



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至郢。（《淮南子·修務訓》）¹⁵

第一、三、四例同，孫詒讓以爲「自魯」至另一地，可解釋墨子是魯人；第二例是迎墨子「於魯」，表示墨子居魯，而外人往迎之。

深究上述四例，確實可解釋爲墨子里籍位於魯地，然而先秦諸子遊歷各諸侯國，文獻中反映的現居地是否足以作爲其故里所在？舉例來說，農家代表許行，學界目前咸認爲魯國人，但於《孟子》中出現了：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孟子·滕文公》）¹⁶

則孫氏所舉證，筆者以爲無法確切指出墨子里籍位於魯地，只能表明墨子活動範圍與常駐地，多數是在魯。

又主張「滕人說」的學者張知寒，提出「春秋」一詞的使用以論證墨子與魯國之關係：

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墨子·明鬼》）¹⁷

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墨子·明鬼》）¹⁸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孟子·離婁》）¹⁹

¹⁵ 見漢·劉安：《淮南子》（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卷19。

¹⁶ 同前註3，卷5下。

¹⁷ 同前註8，卷8。

¹⁸ 同前註8，卷8。

¹⁹ 同前註3，卷8上。



《墨子》論及史書，每以「春秋」稱之，如《周春秋》、《齊春秋》、《燕春秋》²⁰，「春秋」又是魯國方言詞彙，故此兼顧地理、文化背景的例子，實較孫詒讓搜索之文獻直接，值得參照。又自詞彙運用習慣觀察一個人的文化背景，是可行的，加以《孟子》中記錄方言詞彙之文獻佐證，筆者以為可推測墨子生活在「魯」文化影響範圍之地區，故慣用「春秋」一詞。然而無法更進一步大膽推測墨子里籍位於「魯國」，實乃「春秋」一詞之理論支撐度仍是不足的，只得謹慎論之。

（三）、齊人說

顧頡剛、童書業、高成階等主張墨子為齊人²¹。顧、童兩位先生在其文〈墨子姓氏辨〉²²引了例證二則：

公輸般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墨子·公輸》）²³

子墨子南遊使於衛。（《墨子·貴義》）²⁴

²⁰ 張知寒：〈略述我所考訂的墨子里籍〉，《東嶽論叢》1998年第1期，頁68-69：「（墨子）每逢談起史書，不是《周春秋》就是《齊春秋》、《燕春秋》，甚至《百國春秋》等等……。」

²¹ 筆者尚未尋得高成階之文，故此處只引顧頡剛、童書業之論述。又高成階支持「齊人說」參自蕭魯陽：〈臺灣學者關於墨子里籍東西魯說之比較〉，《平原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

²² 顧頡剛、童書業：〈墨子姓氏辨〉，《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集刊》（北京：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集刊編輯委員會，1936年10月出版）。

²³ 同前註8，卷13。

²⁴ 同前註8，卷12。



顧、童二人由第一例「起於齊」，判定墨子居於齊；第二例，顧、童則認為「以方向考之，魯在衛東，宋在衛南，往衛並不得云『南遊』也。」²⁵藉以證明墨子非魯人、宋人，而是合於「南遊使於衛」條件的齊國人。

筆者以為「起於齊」和魯人說提出的「自魯往」有一樣的問題，亦即：交通上的往來記載，可觀察該人活動的地點，但難以確定出發地即是其里籍所在。而對「南遊使於衛」之駁議同上例，又因未指明「從何地」出發到衛國，後人從地理位置上推論，我認為此例所反映的訊息更為模糊，難以成論。

（四）、滕人說（東魯說）

「滕人說」，亦稱「邾婁人說」，指墨子里籍為今山東省滕州。其後漸取代傳統「魯人說」，成為「東魯說」主軸；本文論「東、西魯論爭」，其「東魯」，所指即是滕人說。

一九九零年代起，「滕人說」漸興，至今日已獲多數學者認同；此論由張知寒提出，他在文章中曾提及童書業、王獻唐之言：

五十年代，我曾就墨子里籍問題，請教過我的老師童書業、王獻唐二位先生。童先生說：「我看，墨子應是你們滕縣人……」，王先生說：「童先生的說法值得重視。」²⁶

張知寒得此啓發，進一步探索文獻，利用孟子之言和考古材料，指出古代「小邾國」中的「濫」地是墨子里籍所在。此學說部份內容仍待商榷，然筆者以為張氏搜索的文獻離墨子生活年代近，其證據可信度較高，也有過去不見的創新觀察。

²⁵ 同前註 22，頁 163。

²⁶ 張知寒：〈略述我所考訂的墨子里籍〉，《東嶽論叢》1998 年第 1 期，頁 68。



(五)、楚魯陽人說(西魯說)

「楚魯陽人說」，一般稱「楚人說」、「魯陽人說」或「西魯說」。

墨子里籍位楚地魯陽說，起於清乾隆年間，進士畢沅以「魯，即魯陽，在魯山之陽。」解釋東漢高誘所注之「墨子，名翟，魯人也。」其後，清嘉慶年間武億撰《魯山縣志》²⁷，首先將墨子列為河南魯山縣人，其理論依據源於高誘及畢沅，並提出「墨子與魯陽文君應答再三」為新的證據；且收錄《墨子》，作《墨子傳》納於《魯山縣志·集傳》²⁸。近代學者以蕭魯陽為代表。

又梁啟超批駁此說，舉例如下：

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墨子·貴義》）²⁹

梁啟超認為，若是楚國人，則當曰「遊郢」，非言「遊楚」。筆者以為言之成理。

此乃近二十年興起之新說，主要支持學者為蕭魯陽、劉蔚華、馮成榮、楊靜綺等³⁰，從民俗、方言角度探討，使墨子里籍研究開展新的方向與可能性。然此說引證之現代材料，就時代而言離墨子較遠，尚有許多歷史環節需要再解釋，使「西魯說」的理論基礎較為薄弱。

²⁷ 楊靜綺：〈墨子里籍在河南魯山縣——修志、讀志、用志事例之一〉，《中州今古》2002年第1期。文中介紹《魯山縣志》：「清嘉慶《魯山縣志》是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刊本。『清主魯山縣事董作棟修，偃師武億撰。』武億字虛谷，曾任山東博山縣知縣，為山東解職歸，董作棟便援延武億為總撰。修撰《魯山縣志》，歷代對武億皆有很好的評價，認為他重視藝文、金石之編纂，開創新的編寫體例。」

²⁸ 將《墨子》收入《魯山縣志·藝文志》，對歷代版本與墨子里籍各說有所闡釋，最後主張「墨子，名翟，魯人也」之魯即是魯陽。並案曰：「魯，即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於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

²⁹ 同前註8，卷12。

³⁰ 蕭魯陽：〈臺灣學者關於墨子里籍東西魯說之比較〉，《平原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



（六）、印度人說

印度人胡懷琛撰《墨翟爲印度人辨》、《墨子學辨》等，率先提出墨子爲印度人³¹。他認爲「墨」並非姓，「翟」也不是姓，更不是名，而是「貊狄」或「蠻狄」之音轉；並指出墨子據文獻記載長得黑，學說又主張兼愛、非攻，顯示墨子應該是印度的婆羅門。

單以外表和思想上的相似將墨子當成印度人，是不明先秦時期交通概況所致。墨子一生文獻紀錄雖不甚詳實，仍可探知其大致活動範圍，最南可說是楚國一帶；又印度與中國交流始於秦代，至兩漢才漸爲頻繁。故墨子爲印度人之論只可聊備一說，不是討論的核心。

（七）、阿拉伯人說

金祖同、陳盛良主張墨子可能是回教徒³²。但考證回教（伊斯蘭教）發展歷史，墨子乃回教徒之說便不攻自破：回教先知穆罕默德，一般推算出生年約在西元 570 年（另一說爲西元 571 年），而回教於西元七世紀初在阿拉伯半島開始發展，於西元七世紀中葉（中國爲唐朝時期）從阿拉伯輾轉傳入中國。故回教引入中國與墨子主要活躍時間相差千年之久。且回教爲先知穆罕默德創立，活躍於先秦的墨子竟能成爲回教徒？此說實在不妥。

三、張知寒「東魯說」評議

張知寒近年來深入探索墨子里籍，前後提出六篇重要論文，主要結論爲——墨子里籍應位於古代「小邾國」中一個叫「濫」的地方，今日約於山東省滕州

³¹ 孫以楷：〈墨子生平考述〉，《唐都學刊》2001 年第 4 期。

³² 蕭魯陽：〈臺灣學者關於墨子里籍東西魯說之比較〉，《平原大學學報》2002 年第 3 期。



境內；又張氏考證「邾國」之歷史，該國於春秋早期至中期原為宋國之附庸，春秋後期改為魯國所有，戰國初期又被齊國佔領³³。於是墨子可以是「魯人」、「宋人」或「齊人」，彼此不相違背，乃「邾」國於各時期之不同歸屬所致³⁴。

「邾婁國」之歷史與真實地域，由於文獻不足，還有許多可討論的難題。首先「邾婁國」周初受武王封，為曹姓國，其爵位為子爵；一般推論至戰國中期滅亡，約歷二十多名君主，歷時七百多年，但國君自「邾桓公」起便不可考³⁵。歷史上有「邾分三國」事，古邾國成為「邾」、「小邾（倪）」和「濫」三國，張知寒以為墨子里籍位於「小邾國」中之「濫」。又《邾分三國考》一書以為邾國地理位置應在今鄒縣中部、南部，濟寧東境，滕縣北境，邾國應在東、西、北三面與魯交界³⁶；並指出《春秋》、《左傳》中寫作「邾」國，與《孟子》中「鄒」，在《史記》「騶」，皆指同一國家，依歷史記載，邾國是在魯穆公在位時改名為鄒，降為魯國附庸。

由於歷史上從未見墨子為「邾國人」，筆者以為張知寒的推論應是來自於先秦文獻中墨子與魯國的密切關係，進一步在先秦各諸侯國中找到極可能為墨子里籍所在的「邾」。

而張知寒以為先秦文獻，尤以諸子，談墨子里籍相關敘述可信度極高，他從《孟子》一書搜索能以為證據者，並與先秦諸侯國歷史背景、近代出土文物

³³ 戰國時滅於楚，確切年代已不可考。

³⁴ 同前註 26，頁 68：「不論說墨子是宋人、魯人或齊人，其里籍都在古代小邾國，即今之山東滕州境內。」然筆者以為張氏對「邾國」之敘述不甚清晰，不知究竟是「古邾婁國」或「邾分三國」後的邾、小邾、濫。

³⁵ 見《漢書》〈地理志〉「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為楚所滅。」又《左傳》哀公二十四年記載「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

³⁶ 轉引自王獻唐：《炎黃氏族文化考》（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



一併論之，於其文〈孟子所說的墨子里籍〉、〈再談墨子里籍應在今之滕州〉³⁷，提出理論，筆者將十點證據分爲二類：

（一）、孟子論墨子之言

張知寒爲了證明孟子之言對墨子里籍研究的價值，以四項理論證之：

1.主張「孟子出生時，墨子或者剛逝世不久，或者還在世。」

關於墨子生卒年，學者紛紛考訂，未有定論。以爲至早生於周敬王 30 年（西元前 490 年），至遲生於貞定王初年（西元前 469 年），至早卒於周威烈王 23 年（西元前 403 年），至遲卒於周元安王 21 年（西元前 381 年）³⁸；又孫詒讓考據應於周貞定王初年至元安王之季³⁹。孟子一般則認爲生於周烈王 4 年（西元前 372 年）。則可知孟子出生時，墨子已不在人世，但兩人所處時代非常接近，故孟子對墨子的認知可作參照。

2.張氏認爲「墨子與孟子同爲鄒魯居民」，則孟子論墨之言可信。

分析此說，係直接判定墨、孟二人故里位處相當接近，但沒有推論過程；我以爲此句應當看作結論，不可爲證明「滕人說」材料，且不知張氏置之於此，有何用意？

3.認爲「孟子青壯年期正值墨學盛行時期，對墨子有徹底了解。」

³⁷ 張知寒等著：《墨子里籍考論》（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4 年）。張知寒〈孟子所說的墨子里籍〉、〈再談墨子裏籍應在今之滕州〉二文，皆收錄於該書。

³⁸ 周富美：〈墨子書中的儒（上）〉，《圖書季刊》1973 年第三卷第四期。

³⁹ 劉文清：〈《墨子閒詁》訓詁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7 年）言：「又（孫詒讓）考墨子之生卒年代爲周定王初年至安王之季，即不中亦不遠矣。」



孟子所處時代學風，參「天下之言不歸楊即歸墨」，便可想見墨學之興盛，故張知寒主張孟子必對墨學甚是了解，墨子其人其事也應有一定程度之認識，所以孟子所反映關於「墨子里籍」的史料相當可靠。張氏此論合理。又筆者自先秦學風究之，諸子大多周遊各國，對各諸侯進行遊說，與之交談；而面對各諸侯學術、國家政策上之不同愛好，為提升論辯力度，應當廣泛研究通行於世的各學說，此即所謂「知己知彼」之理。

4. 「墨子之學影響了孟子思想，如誅暴、反戰等。」

儒墨同源為學術上重要議題，各方學者多有論述，此處不再詳談。筆者以為張氏提出此論尚有疑義：學術上的源流歸屬與孟子對墨子里籍認知，似乎並無直接關係？此說應與第三點「孟子所處時代墨學盛行」合併，意即既然能從孟子學說中觀察到墨子思想軌跡，除了表示孟子對墨學知之甚深，也揭示墨學於當時代的影響力，則《孟子》一書有關墨子里籍文獻，確實可供參考。

(二)、墨子為鄒魯地區人士、且為邾婁國人

以先秦文獻及大汶口文化的六項觀察，張知寒主張墨子應居於鄒魯文化範圍內之區域；其中三四五點互有關聯，筆者於其下合併論之：

1. 張知寒提出：「墨子與孟子皆使用鄒魯共同詞彙，也就是『也、乎、焉、哉』等語助詞，不使用楚地慣用的『只、些、兮』。」

上古漢語詞彙分布與使用問題頗為複雜，其語言使用之地域分野是否如此清晰？其地域特色是東西之別或南北之別？詞語交流或混用之情形如何？皆是研究當時語法的重要課題。張氏所言鄒魯地區（先秦時代地域概念屬「東方」）用「也、焉、哉、乎」、楚地（即先秦時南方地帶）用「只、些、兮」，僅說



明大致上的特色。事實上，一般以為屬於南方淮楚文化範疇的老子《道德經》，也用「也、焉、哉」，且不見「兮、些」：

非道也哉！（《道德經》）⁴⁰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道德經》）⁴¹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道德經》）⁴²

先秦南方文學代表《楚辭》亦存「哉、乎、也」：

亂曰：已矣哉……。（《楚辭·離騷》）⁴³

吾獨窮困乎此時也。（《楚辭·離騷》）⁴⁴

又《詩經》中《鄭風》、《曹風》，《衛風》用「兮」，尤其《魯頌》也用「兮」字，：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詩經·鄭風》〈緇衣〉）⁴⁵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詩經·曹風》〈候人〉）⁴⁶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詩經·衛風》〈碩人〉）⁴⁷

⁴⁰ 見周·李耳（撰），晉·王弼（注）：《老子》（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年），第53章。

⁴¹ 同前註，第30章。

⁴² 同前註，第23章。

⁴³ 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漢京出版社，1983年），卷1。

⁴⁴ 同前註，卷1。

⁴⁵ 唐·孔穎達等奉敕撰：《毛詩正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卷第4。

⁴⁶ 同前註，卷第7。



醉言舞，于胥樂兮。……醉言歸，于胥樂兮。（《詩經》〈有駟〉）⁴⁸

以上所舉例，《道德經》、《楚辭》皆有張知寒所謂鄒魯地區才用之助詞，《魯頌》等亦存「兮」字，竊以為張氏之說有待商榷。

張知寒主張鄒魯和荆楚地區各自存在特有之語助詞，並以之為據，判斷墨子里籍位於鄒魯一帶，此說理論鬆散。首先，如何判定何為「鄒魯」地區共同詞彙？「也、哉、焉、乎」又是如何得來？張氏未曾說明；再者，從文獻材料觀察，詞語的運用確實具有地域特色⁴⁹，但其分野實非斷然劃分。

筆者個人推想：或許可以解釋為「張知寒所謂上古漢語北方或南方慣用助詞，如也、哉(北方)，兮、些(南方)，於早期形成時，可能存在張氏所言之各地域使用明分之現象，但從上文搜索之先秦文獻(《詩經》、《道德經》、《墨子》等)，可以發現南、北方皆存在這類詞彙的使用。或許先秦時代各重要文化區(華夏地區、東夷民族區、荆楚地區等)原本皆有其地方方言詞彙，隨著後來文化的交流、傳播及雅言的影響，詞彙的分野逐漸模糊。」故以上「也」等助詞可視作先秦時代共同語詞，但實際反映在文獻上，便與作者個人喜好、習慣有關。如屈原作品多用「些、只」⁵⁰，但不乏「哉、也」，筆者以為亦是屈原熱愛鄉土之表現，故在上古漢語共通詞彙外，寫作之內容多採楚地方言詞⁵¹。

2.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可引作墨子為魯人之證。

⁴⁷ 同前註，卷第3。

⁴⁸ 同前註45，卷第21。

⁴⁹ 探查先秦古籍，「兮」字使用所分佈之地域較「些、只」要廣，後者於楚地多見。

⁵⁰ 〈離騷〉〈招魂〉用助詞「些」者多，〈大招〉用助詞「只」多。

⁵¹ 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1月），頁17提到：「《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的基礎當是周王畿一帶的方言，但是雅言的建立並不意味方言的削弱。」



孟子說明所處時代晉、楚、魯三地稱呼「史書」的不同詞彙，張知寒將此用來作為墨子里籍歸屬之參考⁵²，甚是合理。

3.孟子言：「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張知寒將之與邾婁國之「婁」字義（頭上頂物）聯繫起來，推論即爲墨子故里。並補證一例：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養，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⁵³

（《孟子·梁惠王》）

張氏引孟子的這段談話，說明國家行王道後，人們經濟生活情況好轉，文化水準相對提高，不再使頭髮花白的老人頂著或背著物品奔走各地了；且從孟子此言觀之，當地青壯年仍然得「負戴於道路」，可知孟子時代鄒魯地區依舊存在置物於頂之俗。

4.古文化遺跡「大汶口文化」挖掘出許多成人頭蓋骨，其上皆發現凹陷痕跡，一般判定應該是長期於頭上頂物所致。

張知寒認爲該文化之先民是東夷民族，又地處鄒魯範圍中，可與「婁」字表現「頭頂上頂物」意義相互爲證。

5.引《左傳》昭公三十一年經傳之文爲證⁵⁴：

冬，黑肱以濫來奔。

⁵² 詳細引證前文已述，請參本文（二）魯人說，頁9。

⁵³ 同前註3，卷1。

⁵⁴ 見清·阮元（校）：《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卷53。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

張知寒認為自此之後，「濫」就成了魯國的下邑，如說墨子是魯國人，自然也是可以的。又因為小邾國及其後來被魯國管轄之「濫邑」，均在今山東滕州境內，所以墨子應為今山東滕州人。

綜觀以上三點可一併討論的部份，張知寒曰：「『摩頂放踵』趙歧注為『磨秃其頂，下至其踵』，而婁字依《說文》所錄古文婁，可知其初形本義乃『象人頭頂著東西走路』。」⁵⁵

筆者以為：如是推論，主要重點在於不只將「摩頂放踵」視為孟子對墨子其人之評價，意即「摩頂」不只是形容性之敘述，乃實際描寫墨子或與其相同故里人民的行徑⁵⁶。而置物於頂上的行為，張氏以為乃鄒魯附近先民之俗，又進一步從古文字字義探索，求得「邾婁」之婁初形本義為頭上頂物，遂成為支撐「滕人說」重要理據之一。若孟子依身分、里籍之認知而出此言，則墨子里籍在古「邾婁國」，應可從。但置物於頂是廣大鄒魯地區的習俗，此處應更謹慎的解釋為墨子里籍位於鄒魯地區，是否為邾婁國，尚待更多證據輔佐。

張知寒在確立墨子里籍與「古邾婁國」相關後，自《左傳》援引文獻，以為古邾婁國後來分出的「濫」地於昭公三十一年成為魯國附庸，故主張墨子里籍就位在歷史上曾輾轉被魯、宋、齊三國管轄的小邾國中濫地，且關於里籍研究中「魯人說」、「宋人說」與「齊人說」許多表現墨子為該地區人的材料，都變得不相衝突，皆能給予解釋。筆者針對張氏之說，仔細爬梳《左傳》文例，發現張知寒以為「濫」地原是「小邾國」之論有待商榷。詳見以下：

⁵⁵ 同前註 26，頁 69。

⁵⁶ 同前註 37，張知寒於其文〈孟子所說的墨子里籍〉說到：「經考古學界考定，邾婁人最早即生息發展於鄒魯地區。這裡的居民戴物走路的習俗，自遠古起，一直到孟子時代還普遍盛行。」



冬，黑肱以濫來奔。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

（《春秋左傳》昭公三十一年）

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春秋穀梁傳》昭公三十一年）⁵⁷

春，小邾子來朝。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春秋左傳》昭公十七年）⁵⁸

從文例上看，「邾」與「小邾」應為不同國家。故「黑肱」乃邾國人，非張氏所說之小邾國人。則張知寒所謂的墨子里籍在「小邾國」中「濫」地，應有誤。

6.指出「墨子學說繼承了邾婁文化的傳統，而邾婁號稱『百工之鄉』，墨子生活模式大致趨向和科技成就，與此文化背景密切相關。」

此則以墨子個人生活模式、思想特色與邾婁地方文化做連結，此意見之提出相當珍貴，可為一證。

（三）、小結

「滕人說」廣為現今學界接納，雖仍有部分理論尚待補充，但該說之提出，無疑使墨子里籍之探索更加深入。知名學者任繼愈亦從之，並曾於第六屆國際

⁵⁷ 見清·阮元（校）：《春秋穀梁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卷18。

⁵⁸ 同前註54，卷48。



墨學學術研討會發言贊成此說⁵⁹。筆者以為東魯說之論證，因為邾國相關歷史記載極少，張氏於「邾」國之討論不甚完備，是其缺陷；其他從孟子言論與大汶口文化得來的材料，由於文獻時代離墨子較近，且論說有其道理，頗具參照價值。

四、蕭魯陽「西魯說」與方言材料使用評議

蕭魯陽為近年來推動「西魯說」主力，著有專書《墨子原典校理與其方言研究》、《中原墨學研究》⁶⁰，並發表多篇論文；深究其文，筆者將蕭氏關於墨子里籍「西魯說」之理論分為四大類⁶¹，又主要著力於評析其「方言」引證情形：

（一）、古代文獻（主要含史傳、諸子文獻）

蕭魯陽以為「滕人說」無古代文獻能給予確實的理論支持。並以為「西魯說」之源可參高誘注：「墨子，魯人也」。蕭魯陽解釋：若指東方魯國，則應曰：「墨子，魯國人也」，單稱「魯」，則指地名，即是魯陽。又認為「儒墨同源」說不可信，亦曰「墨行夏道，不可能是嚴守周禮的東夷人」⁶²。並配合古

⁵⁹ 郭成智：〈墨子是滕州人嗎？——就教任繼愈先生〉，《人文》2004年4月第148期。郭文記載2004年於山東滕州召開的第六屆墨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任繼愈先生發言：「墨子是滕州人，最近又有考古發現證明了這一結論。可是現在還有人要爭，說墨子不是滕州人。如果是秦檜，就不會有人爭了！」

⁶⁰ 蕭魯陽：《墨子原典校理與其方言研究》（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3年5月），蕭魯陽、李玉凱：《中原墨學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

⁶¹ 本章節以下論述全參自蕭魯陽四篇期刊論文：〈墨子里籍略論〉《江漢論壇》1998年8月第8期、〈論墨子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許昌師專學報》2002年第3期、〈論墨子方言研究的意義〉《中州學刊》2004年11月第6期、〈臺灣學者關於墨子里籍東西魯說之比較〉《平原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

⁶² 參註61所列舉之論文，得出以下結論：1.《墨子》中引《詩》有不見於今本者，且墨子不特別推崇《詩》，僅用來說明問題。2.引《尚書》多於孔子，且有與今本《尚書》不同者，可見與孔子淵源不同。3.孔子特別注意《魯國春秋》，墨子則注意《周



代地理知識，引「十日十夜阻楚攻宋」事，表示「若由山東一帶（齊或魯）前往，都太遠，不可能十日十夜就抵達。」

蕭魯陽於歷史文獻中廣為探查，認為先秦六藝為共同經典，至孔子整理古籍，六藝才成六經，被視作儒家經典。故雖習六藝，不等於習儒家之學，故儒墨同源論不可信。墨子之明鬼、尊天志反而和楚地思想相近，非鄒魯一帶人文之風。

綜合以上，筆者以為蕭氏之言「先秦六藝為上古共同經典」，本已成學界通說，無須再談。具爭議者乃是其「儒墨同源」、「墨學與楚風相近似」之說。析其文，蕭魯陽認為「儒墨同源」不可信之理由為「六藝非儒家所獨有」，然竊以為學術源流之討論，重點不應全以經典的使用概況論之，而是從思想內涵著手進行研究才是。

（二）、地方方志

蕭魯陽舉證：清嘉慶年間魯山縣修訂之方志即出現墨子魯陽人之記載，可作墨子魯陽人理論依據，並以此批駁東魯說無歷史依據。然筆者以為此說有歷史觀念上的根本問題，蓋清代武億主編《魯山縣志》，率先將墨子納入，該地方之方志前無此例，且武億也是參照高誘注《呂氏春秋》與乾隆年間畢沅之說，非有特殊發現而將墨子判定為魯山人。

（三）、現代河南魯山地方民俗

春秋》、《燕春秋》、《宋春秋》、《百國春秋》等。4.孔子在意《周易》之學，墨子不曾提及。



由於蕭魯陽為河南魯山縣人，對地方民俗與傳說，知之甚詳，但民俗材料可否作為嚴謹的理論依據，尚有許多討論空間，並應盡可能上溯其源。蕭氏提出：

1. 黑陰寺，原名黑隱寺，在今河南熊背鄉境，世傳墨子易黑姓後在此隱居而得名。今熊背鄉有姓黑之居民，自稱墨子後裔。
2. 魯山人暱稱墨子「墨爺」、「墨祖」、「窮爺」，若該人與本地關係疏遠，不太可能存在普遍使用的暱稱。
3. 魯山仍有組織地方守衛隊習俗，似承自墨家舊習。

（四）、以現代魯山方言證之

民國以來，各地方言研究漸興，文獻上遲遲未決的議題，部分能利用方言中「存古」的珍貴資源解之，使古籍用字或語義分析更為精審。蕭魯陽開啓「墨子學」利用漢語方言研究的方向，並系統性地在《墨子》書中找尋河南魯山方言詞語，不可謂無功。但筆者以為蕭氏《墨子》中方言研究，有幾個根本上的問題，使其揀選出的方言詞彙過於片面，難以成為墨子里籍「西魯說」力證。

首先，河南魯山縣方言（或可稱魯山縣當地土話）尚未實施大規模語言田野調查工作⁶³，意即魯山方言語音、詞彙和語法未被完整蒐集與處理；且魯山方言於北方官話中的細部類別、與周遭方言的關係等也未確立，只能初步依其地理位置分區，遂使「西魯說」提出的魯山方言詞證據，有基本的客觀性問題，容易使讀者產生疑慮。我們不能斷然認定蕭魯陽提出的方言詞彙全無價值，然不可迴避的問題是：蕭氏平日所說的魯山方言，是否就是真正魯山方言之樣貌？雖蕭氏一再強調舉例皆能使魯山當地人普遍接受，但以個人語用探究，筆者以

⁶³ 李惠玲、李正輝、呂友仁：〈一部利用方言疏證墨子的力作〉，《平原大學學報》2005年4月，頁98：「為了使魯山方言研究建立在更科學的基礎上，建議魯山縣有關方面組織一次全面的魯山方言調查，形成一個科學的正式調查報告。」



為經由「個人」判定的方言詞彙，值得商榷。一般而言，方言詞的差異多表現在日常用語，尤以頻率高者，如出現頻率極高的人稱⁶⁴，蕭氏舉例較少屬於這方面。

再者，蕭魯陽以現代魯山方言為證，但未解釋此方言有多少之「存古」成分，意即：該方言有怎樣的層次？且呈現於現代魯山話時，於語音或詞彙上又有怎樣的表現⁶⁵。或往更基本問題探索：河南魯山方言源於上古漢語何地，能否說明？若方言本身系統問題無法解決，怎能用之以證明先秦文獻？畢竟河南魯山方言是現代漢語方言，必經語音變異與詞彙使用轉變，不可能完全保留上古方音；故欲以之證成墨子里籍，實然不妥。且蕭魯陽不認為《楚辭》之楚方言特色能作為證成「西魯說」材料，原因是「楚魯陽位於楚國北方，處交通必經之道，受北方或東方影響多，則用語必不同於楚都與楚南方地區。」從地理位置偏北便說可不參照目前所知楚方言詞彙，其言甚謬。

筆者以為蕭魯陽用方言研究墨子里籍，確實有其指標意義，但必須先確立河南魯山方言系統與地位；或更改材料，研究近二十年出土先秦諸國文物，如楚、秦、齊系文字之簡牘帛書、貨幣、陶器等。

上古漢語方言全貌至今雖仍無法得見，但基本概況從文獻可考：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南蠻駮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

66

⁶⁴ 李如龍：《漢語方言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99-117。

⁶⁵ 現代漢語方言研究無法避免「層次」問題，就語音而言，如閩南語「芳」，有聲母[p']、[h]兩類，各來自不同時期。

⁶⁶ 同前註3，卷5下。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孟子·滕文公上》）⁶⁷

可見齊語和楚語是兩個不同的方言，距離相當大；又如註 51 所言，春秋戰國時代存在「雅言」體系以及共通文學語言是可以確定的。故筆者以為可從此處著手，若墨子為楚魯陽人，其語言使用或有可與楚地出土文獻相互參照處，如用韻、諧聲字等。

蕭魯陽所舉《墨子》書中以為乃魯山方言者眾多，以下揀選三個重要例子，也是蕭氏於不同文章皆曾提及者：

1. 安生生：

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墨子·尚賢》）⁶⁸

蕭魯陽稱「安生生」為魯山方言詞，可說「安生」、「安安生生」或「安生生」，意即「社會安定，人民平安」⁶⁹。又王引之訓「此安生生」曰：「安猶乃也，言如此乃得生生也。」蕭氏批王引之說法不知所據，但未說明何故⁷⁰。

蕭魯陽以魯山方言證之，最後得出的句義近於王引之之訓，但構句方式不同：王引之所訓之結構為「副詞+動詞+名詞」，蕭魯陽則是解為形容詞，屬於「ABB」構詞形式，如「亮晶晶」即是此類。蕭氏將「安生生」當成一個獨立的詞，形容社會或人平安；依其所述，魯山方言有從「安生」到「安安生生」

⁶⁷ 同前註 3，卷 6 下。

⁶⁸ 同前註 8，卷 2。

⁶⁹ 蕭魯陽：〈論墨子方言研究的意義〉，《中州學刊》2004 年 11 月，頁 153。

⁷⁰ 同前註。



與「安生生」這樣的模式⁷¹。筆者以為欲探討此說是否合理，必須進一步搜索魯山方言，觀察是否還存在其他從「AB」到「AABB」再到「ABB」這樣的構詞模式語詞，蕭氏所提這類詞彙結構變異的過程，才更具論證價值⁷²。若「安生」、「安安生生」至「安生生」之發展確實具有構詞變異之規律，則可進一步探析其內部結構與詞性異同。然「安生生」之查考確有其意義，傳世先秦文獻中，僅《墨子》中一例，雖然沒有共時的相同詞彙可供參照，我們仍然可以從內部結構進行討論。

從王引之解，則《墨子》中「此安生生」意為「如此一來萬物就可以生生不息」，意義可通釋。「安」為副詞，作「於是」解，用來承接上句的前提，後接下句的後果、結論。第一個生為動詞，作生長、長出解。第二個生是名詞，指生命。

為證王引之說，首先探察上古漢語「安」字，有做副詞者，其中一項意思是「乃是、於是、就」⁷³，如：

既而皆入其地，王安挺志。（～大王就可以寬心了）（《國語·吳語》）

74

則王引之解「安」有其依據，蕭氏之批駁不甚妥當。

若查察「安生」二字，先秦文獻有以下例子：

⁷¹ 同前註 69，頁 154。

⁷² 先秦文獻「ABB」結構的語詞少見，筆者目前只找到《孟子·梁惠王》「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中的「獨樂樂」，但這個詞的構詞方式蕭魯陽所述當成一個形容詞來看的「安生生」截然不同，反而與王引之提出的解釋相近（王引之解「安」為乃、於是、就，整句為「副詞+動詞+名詞」構造，此處「獨樂樂」亦屬「副詞+動詞+名詞」構詞。）

⁷³ 《古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安」字下：「做副詞用，一般用於複句的下一句，用以承接上句。義為『就』、『於是』。」

⁷⁴ 見周·左丘明：《國語》（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卷 19。



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荀子·禮論》）⁷⁵

其桑其松，其杞其苒，種木胥容，榆桃柳棟。群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管子·地員》）⁷⁶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韓非子·問辯》）⁷⁷

第一例「安」作動詞，意思為「使（某人某事）平安」，「生」為名詞，於此指生者，相對於上文之死者。第二例「安」作副詞，意思是平順地、無慮地，修飾作生長解的「生」字。第三例「安」即「何」，怎麼、如何的意思，「生」指出現、生成，作動詞。見上述例子，常見的「安」與「生」於先秦竟有如此紛雜的組合與使用，以上三例「安」、「生」二字，沒有完全相同的呈現，即使詞性相同，語義也有所差異。

「生生」一詞在先秦例子頗多，揀選數例如下：

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莊子·大宗師》）⁷⁸

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脩得生也。（《淮南子·精神訓》）⁷⁹

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列子·天瑞篇》）⁸⁰

⁷⁵ 見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88年）。

⁷⁶ 見周·管仲：《管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

⁷⁷ 見周·韓非（撰），近代·陳啓天（校）：《韓非子校釋》（上海：中華書局，1949年）。

⁷⁸ 見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卷3上。

⁷⁹ 同前註15，卷7。

⁸⁰ 見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1。



以上第一個「生」皆作動詞，意為生長、長出；第二個「生」為名詞，指生命。與《墨子》「安生生」的「生生」字義、結構俱同。

綜上所述，首先是蕭魯陽提出方言詞「安生生」，並說明是從「安生」演變而來，這樣的變化路徑需要再經查考，且將「安生生」定義為方言詞可能也會有問題⁸¹，筆者以為「安生生」於魯山方言的表現，若經由查考確立其依序由「AB」、「AABB」至「ABB」，並有一批也是經由類似方式組成的詞彙，才可說方言在語法構詞上的特殊表現。

筆者透過對先秦文獻的考察，對「安生生」的解釋是：由於先秦幾不見以「ABB」構詞的形容詞，故推測這類形容詞大量出現在語言使用裡，應不是先秦時候的現象。則「安生生」為「副詞+動詞+名詞」的形式較有可能，其中「生生」語義沒有疑義，先秦文獻的表現多為「生出生命」之意，唯「安」字作副詞用時，先秦文獻大多屬於以下兩義：其一為「平順地、無慮地」，其一為「乃、就是、於是」。以上兩者置於文句中，皆能說解，然筆者以為當為後者，主要是依據「安」字加入後整個句子的語義，乃至與前後文配合的程度，「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此一段落，藉「若～」引出前提、條件，後接的句子中常有表示承接的詞，「安」釋作等同於「乃」字，義為「就」、「於是」，用以承接上句⁸²，較之釋作「平順地」，更能配合實際上下文需要的句義接續功能。

⁸¹ 關於方言詞定義，筆者參照李如龍：《漢語方言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99。李如龍歸納出六項「方言詞彙類型」：1.詞根差異；許多單音詞在不同方言以不同字表示，如「吃/喫/食」；2.詞形差異；3.詞義差異；4.詞頻差異；5.詞音差異；6.詞源差異。

⁸² 同前註73。



2. 樵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哀之，乃管酒塊脯，寄于大山昧菜坐之，以樵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墨子·備梯》）⁸³

上文討論重點在「樵」（《廣韻》昨焦切，上古從紐宵韻）字，蕭魯陽以爲「樵」爲「帶著禮物拜訪」，是魯山方言常用字，並提出解釋⁸⁴：

「樵」有看視的意思，但這個「樵」一定得帶禮物，不能空手。逢年過節，走親戚，看長輩，叫「樵」。友朋之間，探望慰問，叫「樵」。……魯山話中，「樵」有慰問、探視、看望的意思，也有公關甚至行賄的意思。……所謂「樵」，一定得帶禮物，不能空手。「管酒塊脯」即一瓶酒、幾塊肉，並不豐盛，用墨子的話說是「客之不厚」，但總是禮物，已符合「樵」的條件了。……墨子若非長期在魯山生活，不應對魯山語言風俗，如此爛熟於胸。這裡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就是「樵」是不是「瞧」的借音？回答說：肯定不是。魯山話中說看，不說「瞧」，也偶爾用觀，但不用「瞧」。「瞧」在魯山話中是文言。

關於《墨子》書中此字，孫詒讓訓之曰：

畢云：「當云『以譙禽子』。」王引之云：「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言相責讓曰譙讓。』」上文「子墨子甚哀之，乃管酒塊脯」云云

⁸³ 同前註 8，卷 14。

⁸⁴ 同前註 69，頁 152。



殊無譙讓之意。「樵」蓋「醮」之借字也。《士冠禮》注曰：「酌而無酬酢曰醮。」故上文言酒脯。⁸⁵

依整個段落文意，「樵」字確實應訓以酬酢義，然而，此用法為《墨子》中孤例，其他三例用樵字者，皆做名詞表「柴薪」，而先秦文獻亦有作動詞表「砍（柴）」者。

城內有傅壤，因以內壤為外。鑿汧閘，深丈五尺，室以樵【名詞】，可燒之以待適。（《墨子·備城門》）⁸⁶

以車輪轆，一束樵【名詞】，染麻索塗中以束之。（《墨子·備穴》）⁸⁷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名詞】為黃旗，石為白旗，水為黑旗……。（《墨子·旗幟》）⁸⁸

樵【動詞】彼桑薪，印烘于堪。維彼碩人，實勞我心。（《詩經·白華》）⁸⁹

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名詞】。不入田，不樵【動詞】樹。（《春秋左傳·昭公傳六年》）⁹⁰

焚咸丘。焚之者何？樵【動詞】之也。樵【動詞】之者何？以火攻也。（《春秋公羊傳·桓公七年》）⁹¹

⁸⁵ 孫詒讓：《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541-542。

⁸⁶ 同前註8，卷14。

⁸⁷ 同前註8，卷14。

⁸⁸ 同前註8，卷14。

⁸⁹ 同前註45，卷15。

⁹⁰ 同前註54，卷43。



上古漢語典籍，諸子書與十三經「樵」字不多見。十三經中，僅上文所舉《詩經》一例，又有《左傳》二例，《公羊傳》一例，皆是名詞和動詞。依據以上查考，語義皆與柴薪相關，故筆者推測本段欲討論「以樵禽子」的「樵」非本字。

爲證孫說，查考上古漢語「醮」（《廣韻》子肖切，上古精紐宵韻）字使用，得《莊子》一例、《荀子》二例，十三經則有八例，且集中在《儀禮》、《禮記》中，皆作酬酢義；值得注意的是，《墨子》裡無「醮」字使用，也無「酬」字。含「醮」字文獻舉例如下：

親迎之禮，父南向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荀子·大略》）⁹²

庶婦，則使人醮之。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儀禮·士禮》）⁹³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禮記》）⁹⁴

此「樵」字依上下文，確知作酬酢義，先秦「醮」字多見，則可能爲音近借用，故孫詒讓主張「樵」字本「醮」字，可從。

王引之釋作「譙」⁹⁵（《廣韻》昨焦切，上古從紐宵韻），此字多作「責備」「相責難」，不合「（墨子）『樵』禽離子」之文意，下舉一則文例：

⁹¹ 見清·阮元（校）：《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卷5。

⁹² 同前註75。

⁹³ 見清·阮元（校）：《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卷6。

⁹⁴ 見清·阮元（校）：《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卷18。

⁹⁵ 王引之此說出自《經傳釋詞》，會援引「譙」字，筆者以爲可能是「樵」、「譙」同爲昨焦切，王引之以爲是聲音相同而有假借情形，故以「譙」解之。然語音關係可通，語義卻無法連結，是其疏漏也。



僂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為置礫湯中？」（《韓非子·儲說》）

96

蕭魯陽處理所謂魯山方言詞「樵」時，特別說明「樵」不是「瞧」，並附註「魯山話說『看』不說『瞧』」，筆者疑惑為何不把已清楚說明為「帶著禮物探望」的「樵」與「醮」字一併談，找證據直接反駁孫詒讓之說；反而兜一大圈，找了個只有「看視」義的「瞧」字一起談，筆者以為《墨子》這個「樵」字重要的語義成分是在「酬酢」這一層上，且單以魯山話說「看」以批駁「瞧」字成說的可能性，不正確也過於簡略。

而「瞧字在魯山話是文言」一說也值得探究，單就此言不知「文言」所指為何，且歷代文獻反映出來的「瞧」字發展，上古、中古漢語例子極少，十三經中僅有一例，先秦諸子書不見「瞧」，二十五史亦未見；直至明、清，才在通俗話本、小說中多見「瞧」字的使用⁹⁷，可推測「瞧」字是從口語中漸漸發展起來；現代漢語書面語表達「看」的動作，亦似少用「瞧」。

又蕭魯陽指出「墨子若非長期在魯山生活，不應對魯山語言風俗，如此爛熟於胸。」筆者以為：拜訪友人時，帶的禮物雖然簡單卻心意豐厚，這種風俗不單單於魯山可見；為了符合禮數需要，又礙於經濟環境，所謂「禮輕情意重」，即是古代社會人際交往之真實記錄。若按蕭魯陽所述，則民眾送禮無法豐盛之窮鄉僻壤皆可為墨子故里，豈不謬乎？

⁹⁶ 同前註 77。

⁹⁷ 明清通俗小說、話本如《醒世恆言》、《三遂平妖傳》、《兒女英雄傳》、《西遊記》、《紅樓夢》等，「瞧」字多用，與「看」一同，使用頻率高，「觀」字則少用，顯示「觀」已脫離部分地區的口語習慣。



3.將養

將養老弱（《墨子·非命》）⁹⁸

將養其萬民（《墨子·尚賢》）⁹⁹

針對《墨子》兩則「將養」，俞樾云：

「將」當作「持」，持養乃古人恒言……。此作將養，形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可據以訂正。

俞樾之說，主張「將」當作「持」，可從。上古漢語除《墨子》兩例，《淮南子》、《漢書》各存一例：

是故聖人將養其神。（《淮南子·原道訓》）¹⁰⁰

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漢書·衡山王劉賜傳》）¹⁰¹

《淮南子》「將養」，與《墨子》例同，「將」皆是動詞，作「扶持、帶領」解，「將養老弱」全句宜譯作「『扶養』年老與身體虛弱的人」，「將養其神」則作「『調養』精神」，也就是「養息」，置於文句中語義略有差異，但不影響我們判斷「將」作動詞，表持拿義。《漢書》中的「將養」字典作「憊憊」¹⁰²，疑為引伸義。

⁹⁸ 同前註 8，卷 9。

⁹⁹ 同前註 8，卷 2。

¹⁰⁰ 同前註 15，卷 1。

¹⁰¹ 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卷 8。

¹⁰² 《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0 年），頁 957。



而蕭魯陽則立新說，以爲「將養」應用魯山方言詞解釋，不該依傳統解作「持養」，才能合《墨子》原意。他解釋「將養」：

在生活水平低下的情況下，儘可能用好一點的飲食，將老弱或多病人民的身體養好。魯山話「將養」比「調養」、「奉養」用心較少，也表示是在物質環境不佳的狀況下為之的。¹⁰³

故蕭魯陽反對「將養」作「持養」解，原因即是主張魯山話的「將養」與《墨子》原文中的對象「老弱」、「萬民」，語義上較能配合，然蕭氏卻未細論作此解時「將」字確切的語義和詞性爲何，似乎僅是語義範疇不同。

綜合以上，由於上古漢語「將養」少見，《墨子》書獨出二例，相對來說使用頻率高，或可視作上古方言特殊詞彙，並予以討論，也能輔助墨子里籍之討論。蕭魯陽提出現代漢語方言魯山話中「將養」，並以之解讀，相較與傳統訓詁解作「持養」，詞義確有其特殊性，可視作爲一個方言詞彙，供爲參照。但回歸解釋「將養其萬民」、「將養老弱」的選擇，「將養」不必非得加入「生活條件差之下的細心養護」等因素才能合乎句意；養護老弱與萬民，是每個國家與社會都會面臨的問題，不論社會經濟條件如何，對所有民眾甚至年老多病的人，都應當給予「持養」，是在位者必然的關懷與責任。故「將養」作「持養」解，本就合情合理，蕭魯陽提出應是方言詞，或可聊備一說。

又蕭魯陽因魯山話「將養」特殊語義套在《墨子》文中可通，便以之判定墨子爲魯山人，理論推演過程甚是簡略粗糙：《墨子》書必不只於墨子故里流傳，除了思想傳播，詞彙也是其中必然傳播的部分，我們無法由幾個詞彙判定魯山便是兩千多年前墨子故里，且詞彙又極易變動與借用，更增添不可確定因素。

¹⁰³ 同註解 85，頁 151。



五、結語

探究墨子里籍歸屬論述，時代或有早晚，論據高下不一，自漢代以來，尤以近代至今，各說紛陳。然透過學者不斷提出新材料或更可信之解釋，墨子里籍問題逐漸除去論證不足的說法，即印度人說與阿拉伯人說，較可信的幾個說法，又有「趨同、合一」之現象，形成「東魯說」和「西魯說」對立之勢¹⁰⁴。

今之「東魯說」，其「魯」所指地域，乃張知寒「滕人說」主張之古小邾婁國濫地（山東滕州），非舊說之東魯（即山東曲阜一帶）。此說建立在傳統「魯人說」基礎上，透過總總例證查考，而得墨子乃鄒魯地區居民之結論，並進一步指涉墨子里籍應位於古小邾婁國，然若墨子里籍真位於此，此說可兼採魯、齊、宋三說，而且不論證明墨子為三國中哪一國人，當中眾多理論及文獻資料，都可引為「東魯說」之證。筆者探究此說後，進一步提出可能的研究面向：能否能藉由深入討論小邾婁國（或廣義的古邾國），尋得更多可能與墨子有關之文獻？再者，梁啓超曾提出墨子既不是宋人，也不為宋大夫，「東魯說」目前尚未對墨子為官問題提出論述，也未涉及墨子里籍與其政治活動之關係。「東魯說」雖已漸成通說，尚有疑議留待討論。

再論「西魯說」，此「魯」指古楚國魯陽一地，起於高誘之言，畢沅、武億進一步發揮，至蕭魯陽集大成。本是較為弱勢的一說，難以和魯人說等相抗衡，但近二十年發展極為快速，逐漸成為一股勢力，並獲得不少河南、陝西地區學者支持。相較於「東魯說」，提出之論證較少是上古典籍的文獻資料，多從現代方言、地方民俗與清代方志探討。

筆者以為就目前學說之理論發展，以「東魯說」較為完備，主要是由於「東魯說」引證之材料多是先秦文獻，時代與墨子接近，對墨子的觀察與相關記載

¹⁰⁴ 蕭魯陽：〈臺灣學者關於墨子里籍東西魯說之比較〉，《平原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二十世紀八零年代以來，墨子里籍的東西魯之爭逐漸成為墨子研究的熱點。」



是較為直接的，少去傳世文獻流衍所產生的問題，如抄寫缺漏、人們見解之偏誤等。「西魯說」證據多是現代方言與民俗考察，企圖將之與生活在先秦時代的墨子做連結，然其中時代差距極大，論證的可信度便降低，真要引為證據，存在許多待解釋的環節，必須層層上扣，極具難度。但「西魯說」相關學者未做歷史上的層層考證，直接以現代材料證墨子里籍問題，其根本理論基礎甚是薄弱。

綜合二說論述，可以發現不論是張知寒或蕭魯陽，皆有意從典籍的字、詞、文法尋求證據，筆者肯定這樣的研究方向，但同時也指出：《墨子》的寫作時代與作者問題，尚有許多疑慮待解，究竟有多少可能出自墨子本人，有多少是墨子後學撰寫，有待討論。故引用《墨子》字詞以論證其里籍，應更加謹慎，若抽離了版本流變、時代背景、思想內涵等層面，則墨子里籍之討論可能過於片面，種種證據也減少了說服力。

墨子里籍成為熱門議題，似乎也開始醞釀一股新的地方文化養成運動。張知寒提出「滕人說」前，山東滕州人根本不曾想過：墨子會與自己同鄉！而河南魯山人或許從清末開始，已把墨子視為同鄉，但西魯說目前處於劣勢，故當地人積極利用各種管道發聲，期望能搶回一些關注。

如今東、西魯兩地各自發展，除推廣墨學，也希望獲得使世人認同該地就是「墨子里籍」所在。於是我們能在山東滕縣看見墨子雕像，也可以到河南參觀墨子廟。兩地都有其道理，但何者為是？然孰是孰非，似乎已暫時不是重點，哪一地能獲得更多中央資源，哪一地能被電影公司認同，或許是他們目前為止的重點方向。可嘆「墨子里籍」議題，近幾年竟背負東、西魯兩地經濟發展的重任，這是過去所難以想像的，也顯現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各地區搶奪文化資產、爭取正名以發展經濟之現象，值得吾輩深思。



然墨子里籍研究，實有其重大意義；由於文獻不足，且墨學自漢代以後便沒落，有太多問題仍待解答，若能盡早確認墨子里籍，相信對研究墨學或先秦諸子的學者來說，皆是相當可貴的研究進程。

（責任校對：杜佳倫）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周·左丘明：《國語》（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
- 周·李耳（撰），晉·王弼（注）：《老子》（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年）
- 周·墨翟：《墨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 周·管仲：《管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
- 周·韓非（撰），近代·陳啓天（校）：《韓非子校釋》（上海：中華書局，1949年）
- 秦·呂不韋：《呂氏春秋》（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漢·司馬遷：《史記》（上海：中華書局，1959年）
- 漢·劉安：《淮南子》（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
-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漢京出版社，1983年）
- 唐·孔穎達等奉敕撰：《毛詩正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
- 清·阮元（校）：《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清·阮元（校）：《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清·阮元（校）：《春秋穀梁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1988年）
-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世界書局，1963年）
- 清·阮元（校）：《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清·阮元（校）：《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清·阮元（校）：《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現代·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二、近人論著

王獻唐：《炎黃氏族文化考》（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

古漢語虛詞詞典編輯會：《古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李如龍：《漢語方言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李漁叔：《墨子選注》（臺北：正中書局，1977年）

孫詒讓：《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1月）

梁啓超：《墨子學案》（臺灣：臺灣中華書局，1985年）

游汝杰：《漢語方言學導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11月）

漢語大詞典編輯小組：《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0年）

劉文清：《〈墨子閒詁〉訓詁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7年）

三、單篇論文

李惠玲、李正輝、呂友仁：〈一部利用方言疏證墨子的力作〉，《平原大學學報》2005年4月

孫以楷：〈墨子生平考述〉，《唐都學刊》2001年第4期

張知寒：〈孟子所說的墨子里籍〉，《墨子里籍考論》（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4年）

張知寒：〈略述我所考訂的墨子里籍〉，《東嶽論叢》1998年第1期



- 郭成智：〈墨子是滕州人嗎？——就教任繼愈先生〉，《人文》2004年4月第148期
- 楊靜綺：〈墨子里籍在河南魯山縣——修志、讀志、用志事例之一〉，《中州今古》2002年第1期
- 趙振鐸：〈先秦諸子的語言觀〉，《中華文化論壇》2001年1月
- 趙振鐸：〈論先秦兩漢漢語〉，《古漢語研究》1994年3月
- 蕭魯陽：〈臺灣學者關於墨子里籍東西魯說之比較〉，《平原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
- 蕭魯陽：〈論墨子方言研究的意義〉，《中州學刊》2004年11月
- 蕭魯陽：〈論墨子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許昌師專學報》2002年第3期
- 蕭魯陽：〈墨子里籍略論〉，《江漢論壇》1998年8月
- 韓東暉：〈先秦時期的語言哲學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5月
- 龐可慧：〈河南過渡語中的方言語詞問題〉，《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
- 顧頡剛、童書業：〈墨子姓氏辨〉，《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集刊》（北京：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集刊編輯委員會，1936年10月出版）

